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一六期 ——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109c)

【亲历者言】	亲历“《解放日报》事件”	赵元三
【史实辨析】	《亲历“《解放日报》事件”》质疑	王树人 解芳雯
【事件调查】	蒙古学者披露林彪飞机坠毁细节	舒云
【文革一页】	我策划了冲击三军演出事件	白而强
【会议简讯】	“九一三事件”研讨会在京召开	丁凯文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亲历者言】

亲历“《解放日报》事件”

• 赵元三 •

1966年11月底，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这个事件是在怎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经过事实与真相如何？

笔者是事件亲历者，事后又做了核实、研究，现忆述于下。

1、上海红卫兵：要批上海市委的“资反路线”

(1)《红卫战报》：“《解放日报》是市委推行资反路线的工具”

在上海市各界革命造反派和北京来沪各路红卫兵声讨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时，上海的红卫兵也被鼓动起来了，他们也要揭露、批判市委的资反路线。在上海各路红卫兵组织中，最大的一个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该组织以复旦大学为中心，几乎囊括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第一、第二医学院等上海各著名高校

的红卫兵造反派。主要负责人有复旦大学的学生马立新，还有劳元一等。其他红卫兵造反组织还有同济大学的“东方红”（负责人陈敢峰等），交通大学的“反到底”（负责人严步东等），以及中学系统的“中学红代会”、“中串会”等。

“红革会”和上海红卫兵总司令部合办了一张报纸叫《红卫战报》，对开一大张。办报人都是各高校大学生中的笔杆子。其中有一个人叫吴鸿业，复旦大学新闻系高年级学生，曾来解放日报社实习过。《红卫战报》1966年11月下旬一期即第九期刊登了一篇揭露、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长篇文章。另外，《红卫战报》认为，《解放日报》作为市委机关报，已变成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2）“红革会”：要求《解放日报》附送《红卫战报》

照中央精神，各地的红卫兵报纸，由各地方的新闻、出版、教育部门负责免费印刷。《红卫战报》是由解放日报社代印的。发行，原来由“红革会”自己负责。

“红革会”于11月27日，向上海市邮政局报刊发行处提出，11月28日出版的《红卫战报》第九期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理由：A、因为这一期《红卫战报》刊登了批判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的重要文章；B、市委应该端正态度，自我消毒，改正错误；C、《解放日报》已成市委推行资反路线的工具，也应该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D、造反报由《解放日报》附送，已有先例——此前，“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司”），以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理由，要求把他们出版的《革命造反报》，夹在《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市委欣然同意，并于11月25日照办不误。

就在这时，《红卫战报》第九期60余万份已经印好，“红革会”提出照先例将这期报纸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不料，却遭到上海市委、解放日报社党委、邮局的断然拒绝。拒绝的理由是：《革命造反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市委没有认真听取邮电局职工和《解放日报》广大读者的意见，贸然同意”，“这种不合理的做法，受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市委主要领导人当场做了检讨”，“邮电部门还就这件事做了检查”；所以，不能再同意《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了。

“红革会”要求遭拒绝，愤愤不平。他们再找市委领导联系，已联系不上了。找解放日报社党委，党委书记马达已“失踪”，只有一个前不久刚提拔为副总编辑的党委委员王树人在主持日常工作。王树人为人温和，言语不多，说是书记联系不上，他自己没肩胛答应附送。他既不敢说市委不同意，也不敢说报社党委不同意，只是同红卫兵打打太极拳而已。“红革会”眼看着已印好的60多万份第九期《红卫战报》无法发行，逐渐情绪焦躁不安起来了。

（3）市委坚拒附送，红卫兵进驻解放日报社

1966年11月29日黄昏，我刚在报社食堂吃过晚饭，有同仁告诉我，报社来了一小批红卫兵，与党委继续交涉附送《红卫战报》的事宜。只见三楼会议室里有十几个红卫兵，大礼堂、总编室门口走动的也有七八个，总共不过二十几个红卫兵。仔细看他们的袖章，大多为“红革会”的，部分为“红总司”的，少数为北京来的。他们是来继续谈判的。报社一方有王树人，以及“文革筹”的负责人，几位支部书记。有两个红卫兵不断走到别的办公室，用电话将谈判情况向“红革会”总部汇报。

我挤入谈判现场旁听，红卫兵反复强调：今天，他们是奉“红革会”总部之命，来落实《红卫战报》随当天《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事。否则，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革命措施。谈判一直

持续到半夜子时，仍然没有进展和结果。

零点敲过，二十余位红卫兵谈判代表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嗓门也大起来。他们说：你们报社党委必须尽快答应红卫兵的合理要求；否则，我们的忍耐已经到限了；我们将要采取革命行动与措施，使你们30日的《解放日报》也不能发行。

解放日报社党委代表们听了红卫兵最后一句话，感到压力了。因为《解放日报》的印报车间主体就在底层，若30日印好的《解放日报》当天发送不出去，就要出大事情了。上海《解放日报》自1949年5月创刊以来，没有一天停止出版或发行过。如果有一天人为地中止出版或发行，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样的事件一旦发生，责任由谁来负呢？

报社党委谈判代表一面继续与红卫兵谈判代表周旋，一边派人溜到有直线和红机（保密机）的房间，与马达秘密联系。马达感到事态严重了，在秘密地点又向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做了汇报。陈丕显与曹荻秋商议后，叫秘书避开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做了请示。一个月后就被毛泽东、周恩来赶下台去的陶铸指示：“群众组织的报纸与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解放日报》就是停刊一个月，也不能同《红卫战报》一起发行”。陈、曹坚决地执行了陶铸指示。

30日凌晨一时，陶铸的指示，陈、曹的意旨，通过马达传达到报社党委谈判代表耳中。党委坚决地回绝了红卫兵的要求，谈判到此宣告结束。报社内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神秘莫测、将要发生大地震的味道。

30日凌晨一时半，一队红卫兵，约五十余人，排着整齐行列，由汉口路274号报社大门进入。进入报社后，把印报车间大门，沿马路的发报间门洞、供卡车进出的弄堂的大门封锁起来。这样，即将开机印刷的11月30日的《解放日报》就不能装上邮车，也不能运送到市内、市外去了。

30日清晨四时许，我感到今夜不能睡觉了。我到食堂去买了一碗稀粥、两个馒头、一碟酱菜。囫囵吞下后，即跑到274号大门外去。见大门东首发报间有一辆绿色邮车，在等待后知道无法装成捆报纸了，即无奈地开走了。五分钟之后，又开来另一辆邮车，同样被红卫兵告知：今天有特殊情况，不能发报，又无奈地开走了。

30日清晨六时报社周围出现一些察看情况的稀疏的人群。有些像公安文保便装人员，也有一些别着“工人赤卫队”、“工人造反队”袖章的人。这些人都在四外逡巡，察看动静。

30日清晨八时，进入报社的一批红卫兵，约有20余人，他们用过早餐后，接替了夜里封锁发报间的红卫兵。夜里封锁发报间的红卫兵分批用过早点后，陆续到报社编辑部、工管部大楼走廊去看大字报，有些人还把其中一些抄下来。

（4）“我们要看《解放日报》”和“我们要保卫党报”

30日上午九时，报社日班职工600多人上班到齐，纷纷相告昨夜今晨报社内发生的事变。有的惊讶，有的默然，有的气愤，有的深思，有更多的人拿起电话，把消息传给社外的亲朋好友，或有关方面。还有社内的红卫兵也不断同总部、外界联系。解放日报社内部的事变很快就传遍了全上海的党政机关、新闻单位、各群众组织。报社周围马路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各种政治倾向的人物和群众组织都把触角伸到汉口路274号的围墙内外来了。

最令人注目的是号称有80万队员的“上海工人赤卫队”，在解放日报社周围出现了。“上海工人赤卫队”，我们上面介绍过，是市委一、二把手陈丕显、曹荻秋支持下成立的一个工人群众组织。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保卫上海市委。当时被称为“保皇派”。在不久后发生的“康平路事件”中就有最突出的亮相。

从11月30日起至12月2日，报社四周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工人赤卫队的人也越来越多。工人赤卫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报社周围建筑物上装了十几个高音喇叭，日夜轮番广播宣传他们的观点，或高呼口号，或向报社内的“红革会”红卫兵和“工总司”属下的工人造反派进行喊话、策反、劝降。大喊大叫“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我们要保卫《解放日报》!”、“我们要保卫党报!”的口号。寓意是你们必须从解放日报社内撤出来，否则我们要攻进去把你们赶出来!后来就干脆直喊：“你们必须从解放日报社内撤出来，不要影响党报编报、印刷、发行!”有的还喊：“你们必须尽快从里面撤出来，否则后果自负!”

报社内部当时被称为“保皇派”的骨干人物，多次乘社内红卫兵不备，向社外的工人赤卫队打手势示意，甚至喊话，要他们攻进报社来。12月1日下午一时，汉口路286号报社侧门曾一度被冲破，涌进数十名赤卫队员。

2、红卫兵争取内外援军

陆续进驻解放日报社内部的“红革会”红卫兵，总共只有一二百名，“工总司”进来的工人造反队员只有一二十名。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与危险：外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赤卫队员包围，他们随时都有冲进来的可能；内有跟解放日报社党委跑的一批骨干人员，他们坚决反对红卫兵进入报社，不断给红卫兵出难题，设障碍，甚至利用报社内工人对付红卫兵，特别是想开门迎接赤卫队员入内把红卫兵强行逐出报社。一场攻守之战、流血冲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红卫兵亟须内外两重力量支援，才能坚守下来，以实现他们的目的。

(1) 解放日报社造反派宣布“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红卫兵试图同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派联系，以争取他们的支持。30日上午，“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领导机构“中心组”召集会议，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研究了局势，做出了支持红卫兵的决议。我是“中心组”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决议：红卫兵批判上海市委、解放日报社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要求将《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合情合理的；工人赤卫队包围报社、围攻红卫兵是错误的，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以上决议以《四点声明》的形式，在报社内部用大字报公布，又排成铅字、手工印成小传单数百份，向报社内外群众中散发，立即受到红卫兵的热烈欢迎。

(2) 解放日报社冒出“红色造反兵团”和“工人赤卫队”

解放日报社党委背后有陈、曹的支持，陈、曹之背后还有陶铸的支持。他们支使一些紧跟党委的骨干分子，以编辑部为主体，成立了“解放日报红色造反兵团”；以工厂部为主体，成立了“解放日报工人赤卫队”。二者分别与“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和“解放日报工人革命造反大队”相对抗。他们的直接目的是将红卫兵从报社内部驱逐出去。

报社的“红色造反兵团”和“工人赤卫队”以“报社革命职工”名义发出一个“最最紧急呼吁”，要求红卫兵三条：“一、非解放日报社职工立即撤出报社；二、《红卫战报》发行办法再

继续协商；三、在没有达成协议前，《解放日报》可以迟几天发行。”红卫兵对此不予理睬。

（3）“工总司”和红卫兵增援“红革会”

从11月30日早晨八时起，不断有小股“红革会”红卫兵和“工总司”属下的工人造反队员进入报社。但数量不多。当获悉赤卫队总部准备发起内外结合的总攻时，“工总司”和“红革会”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增援行动。

12月2日深夜至3日凌晨，“工总司”调来大批工人造反队员，还有“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红三司”、“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等京沪红卫兵造反组织，约有五六百人，冲破赤卫队的薄弱的封锁线，进入报社。报社内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总数激增至1000余人，超过了解放日报社全体职工的数量。这就使报社食堂的伙食供应增加了一倍多的任务。再加大楼被封锁进出，蔬菜运不进，所以，除保证每人每天三顿米、面主食外，八天九夜的蔬菜很少，只好以咸鱼唱主角了。

增援部队进来后，和报社内先进来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一起，成立守卫报社的指挥机构，叫“火线指挥部”。“火线指挥部”指示，不仅对报社外面围攻的工人赤卫队采取针锋相对的强硬措施，而且对报社内部企图阻止、破坏防卫的行为，派人严密监视，一经发现，严肃处理。早在前两天，已有三个紧跟党委的人物被他们盯上了。一个是夜班编辑部的支部书记丁××，红卫兵说他挑动群众斗群众，同他辩论了几个小时。文艺部编辑王××，对报社外面围攻的人群说：“同志们，我是解放日报社的，我欢迎你们上来！”红卫兵指出他挑动外面群众进来“群众斗群众”，同他辩论了半天加一个晚上。还有一个编辑史×，拿了手提喇叭到党委办公室窗口向围攻的人群喊话，红卫兵说他煽动群众冲击大楼，在夜里开会对他批判。

（4）激烈的攻守之战

“《解放日报》事件”历时八天九夜。从外到里、从里至外，从形式到内容，可归结为四个字：攻守之战。

外面的赤卫队和一部分群众，要攻进汉口路274号和286号两座连体大楼，把占据大楼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赶出去，恢复《解放日报》的发行。而大楼里的“火线指挥部”则是指指挥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守住大楼队，阻止《解放日报》发行，直至市委答应要求为止。

外面想从哪些途径攻进来呢？一是门，二是窗，三是顶。里面则针锋相对，守门、守窗、守顶。门有五个：274号门，286号门，发报间的门，发报间门与274号门之间有一个供大卡车进出的弄堂门，还有286号的后门。这些门，在11月30日红卫兵进驻当日就都防守起来了。但防守不严。12月1日中午一点钟左右，286号门一度被冲开，人群直往里涌，朝楼梯上冲。好不容易才重新封堵起来，并把冲进来的人劝说或推了出去。2日，又发生赤卫队用卡车上的又厚又重的跳板冲击274号门的激烈的攻防之战。工人造反队用竹竿从二楼窗口反击进攻者，迫使他们中止了攻门行动。“火线指挥部”总结了两天的教训，加固门防的工事，把防汛用的器材翻出来，加固门防。有很厚的木板、顶梁柱，还有沙袋。另外，还预防万一人群冲进来，开启消防龙头去冲进入者。窗的攻守战，主要在二层和三层窗口展开。工人赤卫队多次用长梯架到报社汉口路朝南房间的窗口，试图破窗而入。有两次，红卫兵把长梯推翻，使长梯带人倒向马路南侧去了。工人赤卫队用的武器是多种多样的，铁棍、木棒、铁锹、杠棒等等。而楼内红卫兵的武器则是工人撬滚筒纸（新闻纸）用的带小弯的铁棒，还有一些钢筋、铁条，再就是各办公室都有的扫帚了。新来的工人造反队员中有几个是复员军人，他们经过军事训练，有些战斗知识。他们提出要控制制高点——楼顶。286号楼顶有一个100多

平方米的平台，他们说这里必须日夜设观察哨，观察大楼四周、马路动静，特别是要注意从其他民房向报社大楼发起的偷袭或进攻。因为报社大楼西、北两面都是同民房相连的。

攻守之战，每天都有发生，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十几个高音喇叭不停地喊叫，使人心烦意乱。“红革会”和工人造反队几次在半夜里冲出大楼，偷拆、强拆高音喇叭。如交电公司的喇叭被拆走了十多个。

八天九夜的攻守之战有没有伤亡？亡，绝对没有。伤，有的。但没有见过现场统计。解放日报社保守组织“红色造反兵团”的传单中有这样的话：“许多群众被他们击破头，打伤了鼻子、眼睛，有的被打得昏迷过去。前来拉救受伤者的救护车日有数起。”

大楼里增员到1000余人后，办公室已变成熙熙攘攘的闹市。大楼四外的马路上围观群众已达日均三四万人。

上海市民的舆论已达到沸点了。上海的第一号报纸——市委机关报，居然四、五天见不着面了，这是17年来闻所未闻的特大新闻！党报怎么样了？上海市党委怎么样了？

3、韩哲一、李干城到报社劝和

（1）“火线指挥部”坚持要市委出面谈判

从11月29日夜开始，三天三夜过去了，红卫兵不仅没见到任何市委负责人，甚至连报社党委负责人马达的面也没有见到。“火线指挥部”认为，报社党委已无权代表任何人谈判了，必须由《解放日报》的主管机关——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派来代表到报社谈判。

直等到12月2日晚，中共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上海市副市长李干城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文焕来到报社。他们的车子在离解放日报社不远的马路上停下，由保卫人员护卫下，穿过人山人海，走到汉口路286号后门。后门也是封死的，但在门的中部挖了一个洞，足可供一个人进出。韩哲一等一行人就是从这个门洞中进入解放日报社的。

（2）韩、李以劝为守，不答应红卫兵要求

韩哲一等一行到报社来，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劝说。“谈判”者，双方都准备好、带来条件。火线指挥部一方的主要条件是明摆着的——就是要《解放日报》附送第九期《红卫战报》。但韩哲一等一行恰恰没有带来同意这个条件的市委意旨。韩等三人对“火线指挥部”的条件既不敢否定，也不敢答应，只是劝说你们先撤离《解放日报》再继续谈。韩哲一谈了一天一夜，说身体不适，先行退去。李干城与蒋文焕又续谈了一天，也无果而离去。总的来说，还是和平谈判，文明谈判。当时的谈判都做了录音。

4、中央文革的指示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情况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到北京中南海，立即引起中央的关注。这些渠道中，非官方的北京来沪红卫兵，《解放军报》来沪记者等，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渠道上报的情况，同市委上报中央的情况，立场、观点大相径庭。他们认为：《红卫战报》批评市委的资反路线、批评解放日报社执行了市委的资反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红卫兵要求《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合理要求；而市委拒绝红卫兵要求，怂恿赤卫队围攻红卫兵，是推行资反路线，势必引起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

中央文革小组经过六天对事态的观察，对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得出结论：上海“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通过《红卫战报》批判上海市委、解放日报社党委的“资反路线”，大方向是革命的、正确的；红卫兵要求《解放日报》附送《红卫战报》是合理的；“《解放日报》事件”是因市委拒绝红卫兵合理要求而引起的；红卫兵进驻解放日报社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12月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共上海市委发出指示：申明以上意见，并责成上海市委，端正态度，不要同红卫兵和上海工人造反派对立，要答应他们的革命要求，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动员包围报社的群众组织撤离，进驻报社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自然也会撤离。

当晚，上海市委研究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认为应当执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停止执行陶铸以前的指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即派出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市委常委宋季文，赶到解放日报社，同“火线指挥部”进行谈判。这是一次真正的谈判。“红革会”以《三项决议》的形式表述了自己的要求。“工总司”则以《四项要求》的形式表示了自己的条件。王一平、宋季文分别、联名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并写上“同意”。这就算答应了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的“革命要求”，“《解放日报》事件”终于走上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三项决议”包括：“《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包括零售户）；‘允许我们查阅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的社论底稿和其他材料、指示等等’”。“四项要求”第二项：“市委必须责成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革命行动。如果干涉革命造反派的行动，我们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第三项“‘《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事后，上海市委必须向我们革命造反派做公开检查。”

5、外兵撤离

1966年12月7日，《解放日报》恢复发行。八天的《解放日报》陆续送到读者手中。《红卫战报》第九期也随报附送到读者手中。

9日清晨，进驻解放日报社内的各个革命造反组织，包括“红革会”、“工总司”，以及“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红三司”、“同济东方红”等撤离解放日报社。

□ 原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

~~~~~

### 【史实辨析】

#### 《亲历“〈解放日报〉事件”》质疑

• 王树人·解芳雯 •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刊登了赵元三的《亲历“〈解放日报〉事件”》一文。这篇文章以“亲历者”的身份出现，给人印象讲的都是真的，似乎“红革会”要求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是“合理的”，而《解放日报》和上海市委硬是不同意，是有意制造麻烦，因而引发了震惊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最后因“中央文革”的干预，并责成上海市委要“端正态度”，答应他们的“革命要求”，才使事件得到解决。好像这一事件不是造反派而是解放日报、上海市委挑起的。

关于赵文中的思想观点，我先不做评论。评论一件事的是非，首先要弄清事实，观点可以

不同，事实只有一个。我是“《解放日报》事件”的亲历者，而且是谈判的当事人，也就是赵文中所说的“刚提拔为副总编辑的党委委员王树人”。赵文所讲的情况与我的亲身经历大不相同，因此想借《炎黄春秋》一角澄清一些事实，让读者明白事情的真相。

关于事件的缘起和矛盾的焦点。赵文说：红革会要把《红卫战报》同《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是因为《红卫战报》刊登了批判《解放日报》和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的文章，要消毒。而且认为此前“已有先例”。说“红总司”出版的《革命造反报》市委就曾同意与《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不料却遭到上海市委、解放日报党委、邮局的断然拒绝”。赵文说：“拒绝的理由是：夹在一起发行是市委没有认真听取邮电职工和《解放日报》广大读者的意见，贸然同意”，“市委主要领导人当场做了检讨，邮电部门还就这事做了检查”，所以“不能同意《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了”。以上许多话，赵文中都打了引号，似乎有人当场这样说过。但我作为参与谈判的当事人，第一，我从没听说过《解放日报》曾和哪个报纸夹在一起发行过；第二，谈判时也没有听到谁说过赵文“引用”的那些话。最近我因家事到了上海，顺便询问当时也参加谈判的邮局发行处蒋处长（副处长主持工作），他说没有这回事。为了慎重起见，他还向处里的同志核实，都说没有。不知赵文讲的这段情节从何而来？

赵文又说：“红革会遭拒绝后，愤愤不平。再找市委联系不上，找党委书记马达已‘失踪’”，只有一个“前不久刚提拔为副总编辑的党委委员王树人在主持工作”，“他自己没有答应附送……只是同红卫兵打打太极拳而已。”赵文又说：“‘红革会’眼看60万份《红卫战报》无法发行，逐渐情绪焦躁不安起来了……零点敲过，20余位红卫兵谈判代表态度突然强烈起来……说：你们报社党委必须尽快答应红卫兵的合理要求。否则……我们要采取革命行动与措施，使你们30日的《解放日报》也不能发行’”。

事情经过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红革会”来人要求将《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我和接待室的负责人张伏年同志与他们开始谈判。我很明确地告诉他们：解放后早在50年代中央就决定“邮发合一”，报刊的发行工作由邮局管，解放日报只管编报，没有发行权。你们要批判《解放日报》的“资反路线”，我们欢迎；《红卫战报》要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我们也没有意见，怎么发行都可以，但发行归邮局管，关于发行问题，你们要去找邮局商量。（作者按：这次看了赵元三的文章，我才感到，当时我这样说实在是多余的。因为赵文说得很清楚，早在11月27日“红革会”就已向邮局报刊发行处提出了，说明“红革会”早已知道发行是邮局管，但为什么却要来找不管发行的《解放日报》呢，实际上是有意来“找茬”的。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因此说了这么一大段傻话。）这样我们又把当时正在报社的邮局发行处蒋处长请过来一起谈。蒋处长对同时发行也没有说不可以，但关键在一个“夹”字。如果同时发行，就是同时投送，正像解放、文汇、人民等报纸谁订了都可以一起送一样，邮发人员的工作量差不多。但如果要“夹”在一起发行，几十万份报纸，要一份份打开来，再一份份把另一张报纸“夹”进去，需要有很多人力和时间，而这时已是深夜，人也找不到，要“夹”在一起发行，确实难以办到。但“红革会”的代表就是不答应。而且说，如果不同意，30日的《解放日报》也不能发行。我觉得他们实在不讲道理。因此我对他们说：“夹在一起发，邮局确有困难，你们说如果不‘夹’在一起发，《解放日报》也不能发行，这就不对了。这不是像姓张和姓李的吵架，却关了我姓王的门吗？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红革会”的代表对于我们的话听不进，并开始堵住出报口，震惊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老实说，赵文虽然自认为是“亲历者”，是“见证人”，实际上并不真正了解情况。举个例子。赵文说：“……有同仁告诉我，报社来了一小批红卫兵，与党委继续交涉附送《红卫战报》的事宜。只见三楼会议室里有十几个红卫兵……他们是来继续谈判的。报社一方有王树人，以



及‘文革筹’的负责人，几位支部书记……我挤入谈判现场旁听……”事实真是这样的吗？完全不是。第一，“红革会”代表这是第一次到解放日报来谈判，不是什么“继续”。第二，谈判地点也不在汉口路274号大楼三楼会议室，而是在汉口路309号底层接待室，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第三，至于谈判代表，报社一方就是我和张伏年同志，加上邮局发行处蒋处长，根本没有什么“文革筹”负责人，也没有什么“几位支部书记”；“红革会”代表也只有几个人，有时也有其他红卫兵进来，听一会儿就走了，根本没有什么“20余位红卫兵代表”。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29日晚，赵元三根本没有到过谈判现场“旁听”，也根本不知道是怎么谈判的、双方究竟说了些什么。因此，他前面所讲的所谓“已有前例”以及“拒绝的理由”云云，完全是臆造之词或者是道听途说。有不少同志总误以为矛盾的焦点是报社、市委不同意“同时发行”，其实焦点是个“夹”字。前面已经说过，当时实在难以办到。而不“夹”在一起，同时发送，一样可以达到批判《解放日报》和上海市委的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得到红卫兵的理解而取得一致，非要“夹”在一起发行呢？前面我说是“找茬的”，其实不仅如此。这里我引用文革中解放日报造反派二把手虞伯贤写的《求索——我在“文革”中的造反史》书中的颇有意思的一段话：

红卫兵组织的报纸，批判省市委党报，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出奇的是，《红卫战报》来人交涉，要求把这期报纸夹在《解放日报》里同时发行，声称便于消毒。现在回头想想，这样的要求不仅天真也十分荒唐，几乎是无理取闹。你要揭要批，就揭就批吧，干吗要夹在一起同时发行呢？但在当时，却是一大‘革命要求’，而且正打在‘走资派的要害上’。在‘文革’中，制造迫使‘走资派’陷于被动的若干所谓‘重大事件’，基本上都有一个过程或称之为模式：一开头都被人们习惯地看做是‘无理取闹’，而一旦发生对立，逐步激化，两者矛盾也做了性质的转化。本来的‘无理取闹’就转化为对红卫兵小将……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进而就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反路线一边的问题；再是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边；最后，这是站在革命还是反革命一边。这是一个陷阱，而走资派又偏偏（按：不是偏偏，是不得不）一步一步陷入这个陷阱。

在文革中，像这样无理变成有理，有理变成无理，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事情真是比比皆是。因此，当我看到赵文中说什么要求是“合理”的、是“革命要求”、大方向是“正确的”，还有什么“一队红卫兵排着整齐的行列进入报社”等等，真有点不寒而栗。（这里说明一下，我之所以引用虞书中的文字，不是说他讲的都是对的，他讲的有些也与事实不符）

“《解放日报》事件”是不是也是一个预设下的陷阱呢？回答是肯定的。按理，这是个实际的困难，为什么却不能得到红卫兵的理解取得一致呢？因为不符合“陷阱”设计者的要求。再退一步说，就是红卫兵一定要夹在一起发行，与邮局发生矛盾，那也应该去找邮局理论，去包围邮局，去关邮局的门，但为什么他们不去找邮局，却偏偏要找没有发行权的《解放日报》，关《解放日报》的门呢？因为这恰恰是设计者所要求的。因为抓住邮局，动摇不了市委，只有抓住《解放日报》，才能抓住市委。据说，聂元梓11月份来上海，就是奉命带着这样的意图来的。“《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不久，上海各造反派就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的几万人大会，从此上海市委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

《解放日报》事件不是孤立的。这正是他们为打倒上海市委，使张春桥、姚文元能够登上上海市委一、二把手宝座所做的一个铺垫；而所谓“夺权”的“一月革命”风暴，是从上海开始刮起来的，就是从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开始的。因此，实际上这也是文革中为全国全面夺权所做的一次舆论准备，“《解放日报》事件”不过是他们棋局上的一枚棋子。正如《党史》二卷所述：“上海一月夺权的先例拉开了全国范围‘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序幕”，“上海的大政大权随即落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操纵的造反派手中”。

现在,“《解放日报》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三四十年了。三四十年后,作为对“《解放日报》事件”实际上并不怎么了解的赵元三,为什么现在要重提“《解放日报》事件”呢?是不是想以“《解放日报》事件”的见证人和造反派的发言人的身份来揭发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呢?我们读了全文以后,发现他并没有揭发出什么秘密。再说,文革以后,党中央已经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工作,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已经作出结论,对所谓资反路线等等也作了诠释,对各地党委班子在他们恢复了组织生活后,也作了正确的评价。我们完全可以用今天的眼光对“《解放日报》事件”作出正确的评判。但奇怪的是,赵元三还是以过去的眼光,以文革的那一套逻辑来叙述“《解放日报》事件”。

□ 原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

~~~~~

【事件调查】

蒙古学者披露林彪飞机坠毁细节

• 舒 云 •

2007年,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朝伦·达西达瓦写了一本小册子《林彪元帅之死》,没有公开出版,仅印了300册。我通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有幸得到一本,从中读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九·一三事件”细节。

◇ 苏联人拿走了林彪飞机上的黑匣子

达西达瓦教授在书中披露:1971年9月13日1时53分至55分,蒙古边防总队的哨兵发现一架大飞机自中国方向414号界碑入侵,声音非常大,没有灯光,飞向苏赫巴托省那伦县。2时,肯特省贝尔赫萤石矿的警卫也发现了从东北向西南飞去的这架大飞机。不久听见巨响,看见火光。

2时27分,在贝尔赫矿西南14.8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这架大飞机坠毁。

这是首次披露林彪飞机坠毁的准确时间,过去都是说2时30分。而达西达瓦的这个坠机时间是准确的,后面还要交代。

最早到坠机现场的是肯特省公安厅驻贝尔赫矿小组代表珠尔默德,其他还有数人到场。

坠机现场燃起大火,面积有一平方公里。他们首先是把火扑灭,同时采取保护现场的措施,白布单盖着的九具尸体没有挪动。然后搜集没有烧毁的文件、物品,派人骑摩托车到省会报告。

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带着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到坠机现场时,蒙古人和苏联人已经把重要的物品拿走了。

蒙古肯特省公安厅厅长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在休养所休养,9月12日晚上他去参加舞会,13日凌晨2时多他听到飞机的声音,并不知道是什么飞机。

这说明林彪专机飞得低,所以声音非常大。

9月13日一大早,县政府叫他快到省会去,中午,省里派了一架双翼小飞机送他到现场。

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在空中绕着坠机现场飞了两圈，用电话向蒙古公安部长德吉德少将汇报了看到的坠机现场情况。

不久，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登比列格、公安部长德吉德、情报局局长德钦将军，国防部第一副总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坐伊尔－14飞机也来到现场视察。

9月14日零时，蒙古公安部部长德吉德接到中央电话，让去现场的人员立即返回乌兰巴托，向以泽登巴尔为首的政治局汇报。可是温都尔汗机场没有夜航设备。正一筹莫展时，蒙古人民军空军司令朝克将军责成机场，准备一批小铁桶，隔一百米放一个，装上木块，浇上汽油，点上火，以此充当跑道灯。

原来温都尔汗机场没有夜航设备，潘景寅夜间驾机，就是飞到温都尔汗机场上空，也不可能发现简陋的红土跑道。

9月14日这一天，朝克将军到坠机现场。一批苏联军事人员从俄罗斯赤塔州后贝加尔军区乘坐米格－8直升机也到了。朝克将军和苏联人在现场会晤。

苏联人刚开始关注的是这架英式三叉戟飞机的技术资料，并没有关心飞机上的乘员。

云登副外长回忆，苏联大直升机9月15日上午拉走了一台发动机。

苏联人拉走发动机的动机非常可疑，过去人们都说是苏联人想研究英国的先进技术，现在看来未必，很可能苏联人想掩盖什么。

达西达瓦说，苏联人把坠毁飞机的黑匣子也取走了。黑匣子里有很多仪表，记录着工作情况和人员谈话，是比较可靠的工具。

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认为不行，不能让他们拿走，但是朝克将军还是把黑匣子给了苏联人。苏联人拿走黑匣子之后，从来没有对蒙古讲过黑匣子里有什么内容，这给我们调查飞机坠毁原因带来了困难。

林彪专机的黑匣子在苏联人手里，可至今俄罗斯仍秘而不宣，还大量散布林彪专机飞到苏蒙边境的谎言。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要黑匣子？首先国内没有指示，当时大使许文普、孙一先等并不知道飞机失事首先要找黑匣子。更何况因为中蒙谈判中断，现场所有物品都没有移交中国。

◇ “林彪手令”和航图也不见了

朝伦·达西达瓦在《林彪元帅之死》中比较详细地列举了坠毁飞机的有关物品。他在担任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前，曾任蒙古国家档案馆馆长，他应该是看到坠毁的林彪飞机清单的。

达西达瓦说蒙古的调查人员在现场看到一些文件，如飞机低空高度仪的俄文说明书等有关材料。可能是飞机的遗物太多了，达西达瓦并没有详细列举所有物品。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一书中提到，他在现场拣到一张英文注意事项，写明飞机型号T r i d e n t－I E（三叉戟I E），据此孙一先估计这是一架专机。再往前走孙一先看到一条宽条纹的小型毛毯，上面印着P I A（巴基斯坦国际民航

缩写)。这些达西达瓦都没有提到。

沈庆沂在坠机现场发现一个红色塑料皮的小册子，64开。红塑料皮大部分烧焦，看不出书名，里面的文字只烧掉一个角，开头是“首长和同志们”，结尾是“长时间热烈鼓掌”。看来是一个讲用报告，讲了空军的发展，其中讲到技术革新，举例说有一种微型电台超过国际水平，还有型号和数据。孙一先用照相机把这几页拍了下来，心中奇怪为什么蒙方没有拿走？

当时孙一先、沈庆沂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据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回忆：林立果把这个讲用报告放在上衣口袋里，里面夹着一张横写的“林彪手令”。1971年9月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到西郊机场，下飞机时他曾出示给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看，以后林立果又给林办老秘书关光烈看过。

沈庆沂和孙一先在坠机现场翻过这本小册子，想拿走，但被现场看守的蒙古人制止。他们注意到小册子里面并没有夹着“林彪手令”。

难道是蒙古或苏联人把讲用报告扔下，把里面的“林彪手令”拿走了？

沈庆沂注意到两堆尸体中间，有一堆物品，明显是蒙古人堆集起来的。其中有两个飞行员图囊，一个烧了一半，另一个基本完好。孙一先打开图囊，里面只有几只黑铅笔和红蓝铅笔。他问航图哪去了，蒙方陪同人员摇头不语。

图囊旁边是一堆手枪，大多完好，有几只枪的枪把烧焦，露出空子弹梭子。孙一先数了数，子弹43发，没有空弹壳。还有两个手枪套和几个空弹夹。沈庆沂看到手枪有六支，一支苏制AK型，五支写有“59SHI”。蒙方问“59SHI”是什么意思，孙一先回答，是手枪型号，1959年中国制造。

◇ 坠毁飞机上有一块手表定格在2时27分

达西达瓦在《林彪元帅之死》中记录的坠机现场物品：

六支枪（蒙古和苏联的联合调查报告中说是八支枪），有的枪上了膛，有的保险关着。还有一支微型冲锋枪，两把匕首。

中国纸币65元，一张5元，六张10元。

李平出入证，3726部队营门出入证。

林立果证件，002003号。

一张合影照片。

其他物品：钢笔、铅笔、罐头、糖、梳子、餐具。

还有烧坏的一只白色女鞋；烧坏的一只灰白手提包，里面有一件绿色军上衣；还有三件旧蓝布裤、胶鞋、白背心、手帕等。

物品记录本、燃油记录本、手电、轮胎压力表、逆光镜等。

飞行员包一个。

3726部队第三中队邵起良的空勤工作记录。

布票，飞行员须知，飞行专业课本。

便携式录音机一台，三盘录音带，录有毛主席语录歌曲。

手表五块，一块上海牌，表针指在2时27分。

这个时间准确说明了林彪飞机坠毁的时间。因为飞行人员的手表必须准时。而叶群、林立

果等人要跑，也需要准确对时。还有一块黑盘表没停，17时30分，与乌兰巴托时间相符。此表可能是林立果的，确定了蒙古政府官员到达坠机现场的时间。

飞机交接记录本，新疆地区飞行图，泰山机场图，油本，低空技术说明书，使用细则，华东地图，飞行时刻表，译文四页，报务制度，航空简语。

在这些地图中，应该有达西达瓦没有提到的山海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图。

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事后回忆，机内发现一张标出航线的航图，从河北省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茨克。

迫降在怀柔的直升机现场也发现同样的航图。就像“林彪手令”有横竖两个一样，山海关到伊尔库茨克的地图也应该有两个。不知道为什么，达西达瓦没有提到这张标有伊尔库茨克的航图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及讲用报告里面的“林彪手令”。很可能这张航图同三叉戟主发动机、黑匣子一起，被到坠机现场的苏联人拿走了。

在这些物品中，孙一先和沈庆沂见到了林立果出入证，没有贴照片，但写有林立果的名字，男，24岁，干部。沈庆沂让孙一先把这个出入证拍下来。

孙一先和沈庆沂还见到达西达瓦省略的一些物品：一本《法兰西内战》，一个巴掌大的拍纸本，用铅笔写一些零散的字，内容不连贯，难以猜透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红塑料皮空白日记本，一个汽车驾驶执照的塑料封皮，数张一角钱，以及扑克、小勺、水果刀等。

至于白色女鞋，达西达瓦说见到一只，而沈庆沂和孙一先则见到了两只，是乳白色半高跟浅口女皮鞋，其中一只鞋腰和后跟烧焦了，另一只完好。鞋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在迫降前，机上所有人已经脱掉了鞋。也就是说，飞机坠毁时，鞋和人不在一起。

◇ 关于林彪专机的有关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朝伦·达西达瓦披露了林彪专机坠毁现场发现的“飞行登记本”的内容。

从1970年12月5日至1971年9月12日，每月飞行6至50次，共飞270次；1971年9月，飞行80次。

1971年1月至9月12日，每月夜航2至18次，特别是9月2、6、7、8、9、10日夜航。

8月飞行50次，9月20次。

在新疆沿苏联边界12个城市飞过。

从华中8个城市，加油17次，共加油63492升。

这些数据是真实的吗？

林彪专机地面机械师沈宝发解释说：加油本应该是256号三叉戟的。加油63492升，并不多，三叉戟一次就可以加20吨以上的油。

至于“飞行登记本”，不是256号三叉戟的，而是某飞行员个人的，与256号三叉戟无关。因为专机机组成员是临时组合，并不是完全固定在某一架专机上。

也就是说，达西达瓦公布的飞行记录是飞行员个人的飞行记录，不是256号三叉戟的飞行记录。

256号三叉戟1971年9月6日才交付使用。沈宝发回忆：此前256号三叉戟一直在改装，拖得我们都烦了。

据沈宝发讲，本来林彪专机是要用254号三叉戟的，这是巴基斯坦总统座机。但因为飞行时机头被小鸟撞过，有一个小坑，显然不适合再作为一号专机，于是决定改装256号三叉戟，用作林彪专机。四架三叉戟进口时已经在巴基斯坦飞过好几年，一些机件老化，必要的备件买不到，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四架三叉戟的飞行时间不一，原则上把四架三叉戟上最好的零件换给256号三叉戟。西郊机场修理厂和林彪专机的机械师一起，开始大规模改装。除把普通客舱拆掉，隔出单间，设置卧室、办公室外，还按林彪怕风、怕光和喜欢绿颜色的习惯，精心布置机舱，整整改装了三个月。

“九·一三事件”后进驻空军34师的总政工作组成员刘岩回忆：1971年8月潘景寅试飞，去过山海关，也飞过较远的航线。但他始终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9月11日，潘景寅再飞东北航线，经沈阳二台子机场，再到长春，接回在长春解放军医院治疗小儿麻痹的大女儿。有人看潘景寅情绪不好，询问他。潘景寅回答飞机落地还是不理想。

9月12日傍晚，林立果坐林彪专机从西郊机场到山海关机场，9月13日凌晨林彪第一次坐256号三叉戟，就机毁人亡。

◇ 蒙古政府关于林彪专机的现场调查

达西达瓦在《林彪元帅之死》中披露，蒙古政府调查人员从林彪专机坠落地点向南500米的地方看到第一具尸体。九具尸体散布面积为50米×20米，尸体之间相隔3米至15米。烧伤程度1至2度。

蒙古政府调查人员开始只拍了八具尸体，没发现第九具（飞行员潘景寅），后来才发现，他爬远了。

而据孙一先拍的潘景寅的尸体照片，潘景寅仰面朝天，两臂伸过头顶，手心朝前，似举手投降状。他的两脚叉开，左腿挺直，右腿弯曲，脚跟蹬地，像是要挣扎着站起来。孙一先说：看来潘景寅生前似非常痛苦而折腾过。翻过身来，他的后背尚贴着衣服残片及枯草，臀上剩有裤腰碎布及一段腰带。

难道潘景寅在飞机爆炸时还活着，并在火中爬行了一段，然后挣扎翻身想蹬地站起来？但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与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谈判的蒙方人员认为，中国这架256号三叉戟在蒙古坠毁，可能有特殊任务。蒙方要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提供飞机乘员名单，中国方面没有正式答复。蒙方认为：如果真是民航飞机，蒙方的要求是可以满足的。

在这种情况下，蒙古政府认为，要确定这架飞机坠毁和人员死亡的原因，必须要有一个调查报告。

蒙古政府组成由国防部第一副总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为首的政府委员会，成员以去过现场

的有关部门负责人为主。应蒙方邀请前来的苏联有关部门高级专家协助该委员会调查。

1971年10月12日，在蒙古国防部、总参谋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中，苏军驻蒙古司令官克里夫达中将介绍了苏方对坠毁飞机调查的看法。克里夫达说：坠毁的中国飞机隶属驻扎在北京郊区的第34师，中方说该机民用。我们很容易证明，这架飞机属于军用，机上人员穿着军衣，这是否认不了的。还有所有人都带了手枪，还有自动枪、飞行地图、呼号，从这些来看，完全表明这架飞机是军用的。

找到的枪大部分是有子弹的，有一支上了膛。是什么原因要子弹上膛？是用于野外降落，被俘时自己使用？除此没有别的目的。估计飞机的平均时速670公里，说迷航没根据，这架飞机装备现代化，不可能不知道飞到哪里。如果说迷航，飞机应该发出求救信号，但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潘景寅没有发出求救信号？因为通信员陈松鹤没有上去，潘景寅不会发求救信号，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克里夫达强调雷达是看不见的，当地人看见这架飞机飞得非常低，声音很响。

克里夫达认为，至于燃料用尽完全是谎言。剩多少油？还能继续飞多长？通过仪表就能知道。从着火情况看，证明这架飞机有足够的燃料。

林彪专机在坠毁时决不止2吨半油。

迫降也不可能。要迫降，大飞机必须照亮降落地点。

如此说，林彪专机迫降时没有打开飞机翅膀上的灯，那蒙古目击者再老眼昏花，又怎么可能把灯光看成火光。

蒙古专家认为，当时飞机翅膀灯没有打开，根本没有考虑照明，也没有放下起落架。林彪专机在迫降时确实没有放下起落架。按一般迫降应该是尾部先着地，但林彪专机不是这样，飞机头部先着地。证据是所有仪表在着地一刹那都已经碎了，降落时发动机没有熄火。飞机落地后又第二次跳起来，再着地，飞机就解体燃烧了。不过发动机没有完全烧毁。

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林彪专机是以较大速度尾部接地，形成跳跃，然后两翼先后折断，机身呈圆筒状，带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

克里夫达说：飞机弹起又第二次着地时，机上的人还活着。为什么？因为尸体主要是在机舱左边，说明有准备，企图通过舱门下飞机。

从九具尸体都没有戴手表和穿鞋看，他们是做了迫降准备的。

如果我们到现场早一些，也可能有轻伤员被活捉。从九具尸体的最后动作看，至少潘景寅和林立果在被飞机甩出时还活着。因为他们的表情痛苦，似在火中挣扎过。

苏联克格勃任命侦察员扎格沃茨丁将军和病理学家托米林组成鉴定小组，10月中旬来到蒙古温都尔汗坠机现场。

奥特根扎尔嘎勒回忆：苏联克格勃派来的人员住在乌兰巴托大天口（蒙古国宾馆）。这个小组到现场工作，是取得蒙古有关部门批准的。派给他们一排士兵、公安部司长姜仓巴拉桑上校、国家保安总局四处化学鉴定专家班兹拉格奇少校，陪他们一块去现场。

为了蒙古这些工作组，在苏布拉嘎盆地，搭了五个蒙古包。苏联来的人员中，还有苏联国防部法医局局长、克格勃侦察局长、根据头骨恢复原貌专家。

1994年4月17日《红星报》提到，1971年10月19日，鉴定小组在坠机现场打开坟墓，看到两具尸体镶着金牙，怀疑是林彪和叶群，取走了两人的头骨，带回莫斯科。11月中旬，扎、托两人又冒风雪赴蒙古，将林彪无头的尸体再挖出来，查看肺部是否有结核病症。托米林用双筒显微镜找到林彪尸骨的右肺有钙化点。

◇ 林彪飞机因机内发生争斗而坠毁

朝伦·达西达瓦说，蒙古政府委员会进行大量工作后，于11月20日写出《查明飞机坠毁原因的报告书》。其结论如下：有民航标记的256号飞机是军用飞机，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需要。多数座位被拆除，用于特种的军事需要。中国256号飞机由于飞行员犯下了飞机驾驶错误而坠毁，不是因为某种迫降原因而降落的。

关于“九·一三事件”，有三个国家的人到过温都尔汗坠机现场，蒙古、苏联和中国。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外交官最后到坠机现场，没有拿走任何东西。苏联虽然比蒙古晚到坠机现场，却拆走了飞机的主发动机和黑匣子。后来为了证实是不是林彪，苏联人又第二次、第三次来到坠机现场，挖开坟墓，取走了林彪和叶群的头骨，并检查林彪的肺部钙化点。

关于林彪飞机坠毁原因，1972年，中国空军专家组根据坠机现场的照片，结论是“油料不够”。

2006年9月13日，日本共同社驻乌兰巴托记者获得了蒙古政府1971年11月20日关于林彪坠机的调查报告——《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原因的确定文件》。这份调查报告共有16页，包括现场照片。蒙古的调查报告否定了林彪飞机因燃油不足而在迫降坠毁的说法，蒙古相关人士暗示当时机内曾就逃亡问题发生争斗。日本共同社记者采访了蒙古国家检察厅前副长官，曾作为当地治安最高长官的奥特根扎尔嘎勒。

调查报告说：1971年10月8日至18日，蒙古专家和苏联专家共同进行了林彪飞机失事调查。排除了林彪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英国制造的三叉戟在气候良好时极少犯航线错误，而且也没有接到这架飞机的任何无线电通信。中国解释说这架飞机犯航线错误是说不通的。调查报告还对燃油不足表示了怀疑，说坠机引发的大火，在极广的范围（975米×321米）内燃烧了很长时间。

调查报告说林彪飞机的发动机是正常的。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机上人员作出了降落的决定。蒙古专家和苏联专家得出一致的结论：导致这架飞机坠毁的直接原因是机内发生了争斗，一方想去苏联，另一方想返回中国。在发现的八支枪中，有一支已经上膛。但机上是否发生与枪击有关的暴力行动，还是一个谜。

据日本共同社得到的另一份蒙苏联合调查报告中，说在林彪尸体上没有发现弹孔。

蒙古和苏联的调查报告为什么不提苏联拿走的黑匣子？苏联人对温都尔汗坠机现场最积极，但却始终缄默，更只字不提林彪专机上的黑匣子。只有一位采访过苏联知情者的澳大利亚记者汉纳姆在报道中披露，黑匣子里没有与地面通话的声音。还说林彪的死因（苏联）只有勃列日涅夫等四个人知道。

至于林彪专机的残骸，奥特根扎尔嘎勒回忆：在坠机现场，我看见有些很好看的残留小地毯、餐具碎片，当地人作为纪念品拿走了。还有到当地旅游的人找金属碎片做刀子。当地人说尤其在90年代初蒙古搞出口废铁运动，飞机金属片完全没有了。有中国国旗和飞机标志的飞机尾部，曾存放在贝尔赫萤石矿的一个院子里，90年代初把它作为废铁出口到中国去了。还有一个发动机，“雄鹰”公司经理、历史学家思赫赛汗在乌兰巴托西南26公里处建立了成吉思汗庭院旅游点，用吊车、货车把林彪出逃时坠毁的飞机发动机残骸拉到旅游点的空地展览。（此文得到沈庆沂、孙一先老师的大力协助，并经他们逐一审稿，特向他们和朝伦·达西达瓦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

□ 原载《文史参考》2011年9月1日 第17期 / 总第41期

~~~~~

## 【文革一页】

### 我策划了冲击三军演出事件

• 白而强 •

“文革”中震惊全国的“‘五·一三’冲击三军演出事件”，我是策划者之一，后来还被说成是“现场指挥”。近年来看到一些作品所涉及的“五·一三”事件提供了一些新史料和新观点，给我以很大启迪。尽管往事正在湮灭，记忆已在衰退，但是能从个人角度写出我对这一事件的残留回忆，或许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提请当年的“亲历者”补充、校正，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

#### 一、“五·一三”前的海政两派

“文革”时我是海军军乐队队员，是海政文艺单位最早的“东方红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后来机关干部也纷纷成立群众组织，与我们同观点的一派在海军大院中被称为“红流”派。

军队里的“造反派”基本上是步地方大中学校运动形势发展步骤的后尘而发展起来的。当军内单位起来造反的时候，地方院校里最早起来“破四旧”的“联动”和最先接受工作组领导组成“文革”领导小组、后来又保工作组的以所谓“红五类”为主的学生组织都已经被“中央文革”点名压了下去，所以尽管军内文艺体育单位最早起来“造反”的某些成员家庭、社会背景甚至思潮都与地方的“联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当时的社会大形势和我们面对的与军队管理体制的矛盾等因素，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再重蹈“联动”覆辙，而只能投身于最“时尚”的“造反”大潮，并逐渐与当时最受“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走到了一起。

这样一来，军内最早起来响应毛主席号召的“造反派”组织就逐渐接受了“中央文革”的极“左”思潮，并在“毛主席号召我前进”的思想指导下与“中央文革”支持的群众组织（如“首都三司”等）联合到了一起，成为“并肩战斗”的战友。

所以，当1966年10月2日颁发《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否

定军队的特殊化，容许军队参加“文革”的时候，我们这一派最先表示热烈拥护；1967年1月28日“不许这、不准那”的“军委八条”发布时，最先感受到压制而内心抵触的，也是我们！而当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发布“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时，我们又觉得“中央可能决心支持军内造反派”了……

从1966年6月到1967年4月，经过将近一年的造反、压制、沉默、爆发，反复的冲突，我们与北京、外地的一些“造反派”组织都建立并加强了广泛的联系，在全国、全军已经有了越来越大的名声和影响，一时间颇有些“自我感觉良好”。

而对立面组织则抓住“李、王、张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反对李、王、张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旗各自为战——“五·一三”之后形势明朗化，直属机关和文工团的若干群众组织才联合在一起成立了“海军红色联合造反总部”（时称“红联总”）。

在机关大院里，我们一直处于少数派地位；对立面虽然在外面被我们称为“臭老保”，而在大院里则有来自上上下下，特别是“李、王、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力支持，在领导系统、后勤保障等方面比我们一群毛头小子要占据很大的优势。

就在这种两军对峙的局面下，两派的头面人物都在苦心孤诣、挖空心思地寻找着打破僵局、夺取控制权的时机。

我们当时全部活动的中心，就是要争取让“中央文革”、“全军文革”了解军内“文革”的“真实情况”，从而支持我们的造反，否定对立面的“保皇”行为，以保证“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永远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进入5月之后，双方的直接对立公开冲突暂时沉寂，几乎占了些上风的我们借机组织了一个文艺演出队，到各个“造反派战友单位”去演出，对“战友”表示支持并借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对立面组织在各军兵种党委庇护下也在巩固阵地、整顿队伍、悄悄串联起来搞一些小型演出活动、寻找翻盘的机会。

双方都在积聚着随时可能爆发“决战”的力量……

## 二、我们的对立面头头郑季信的回忆

“‘五·一三’就是我策划的。没有我就没有‘五·一三’！”——当年的对头、现在的朋友郑季信在电话里对我说。

当时我们已经是少数派——我当头的“拼到底革命造反派”（后来成为“海政文工团红色联合造反舰队”的“旗舰”）当时只剩下7个人。有一天就在我家里，在场的有我、李萌茹、林丁丁、高育发、高象柱，我就提出来，快到5月了，我们可以以“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名义组织个文艺演出。大家就同意了，决定去联系其他军兵种文工团。李萌茹、张云星先联系军艺，被人家打了出来；又去工程兵文工团，又被打了出来。然后他们去找北京军区、空军文工团。当时他们也属于少数派，处境很困难，就同意了。接着又联系了4510（卫戍区）和北空。他们都同意联合演出。就这样最早由五个文工团决定联合演出——“纪念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我们商量演出节目，选定萧华的长征组歌，演出场地联系了北京展览馆。

我们开始组织排练以后，就传来消息说有人要来冲。我说好啊，他们敢来冲“纪念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演出，我们就好反击了！

为此，我们让张云星和空军的一个人去总政领导汇报这个动态。他们找了（文化部副部长）李伟，李伟又转推给萧华。

当时萧华的指示是“你们也不要演，他们也不要冲”。

我们认为这简直是胡说——我们不演了他们冲什么？这不是明摆着压制我们吗？所以后来5月22日在大会堂周总理接见三军时（萧华、余立金、张秀川等领导在场），我还把萧华这个表态当面向总理告了状！

“五·一三”当天，军区郑维山，空军吴法宪、余立金，海军……都到了现场。

总之没有文工团，没参加演出，所以邱会作没去。

冲了以后，陈伯达在北京展览馆说：“也可能二十年后是一场噩梦。”

### 三、关于“五·一三”的笔记

我保存至今的一本1970年笔记本（在“牛棚”里“交代罪行、自我批判”的笔记）记载了1967年4月底、5月初我所参与的一些主要活动——

4月15日、17日，军艺开会，文体单位“受死”，京西宾馆反映王玉兰、李炳丽主持。

4月16日，三座门夺权见萧华、关峰。事先在中国京剧院见戚本禹去中央音院送传单知成消息，晚上人大会堂首长接见。

4月17日，大院贴反对打砸抢标语。

同期组织演出队开始演出，陈得牛等支持。

4月底或3月初曾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开会，舒小摸通知工农兵文艺公社打仗退出。

4月成立批刘联络站，高正路负责。

4月底知文艺公社请三军联演，和郑邦炎、郑国培去拆台。

4月下旬曾几次和郑去三座门找丁（负责文体单位）不成。

5月1日，在颐和园演出。

5月4日，在高院、北邮、科影、友谊宾馆、政治学院等地演出，半夜闹事。

5月上旬，演出为主。

5月11日，知演出事，策划冲击，告郑，去总歌，回，大院发像章大会，捣乱。

5月12日，政治学院大会，斗罗、去送旗。

5月13日，上午写大字报，中午去后勤，黄磊，郑邦炎，二炮，下午贴大字报，晚；中击。

5月14日，晨，伯达、富治等首长在北展，萧华、王力也去……

回大院，晚逃出。去总歌，到团校，审军艺。

上述文字可以证明：

- 1、三军的“联合演出”在4月底已经开始；
- 2、我知道“文艺公社”请三军联合演出的消息后就立即和郑邦炎、郑国培去拆台；
- 3、三军要在北展演出这件事我是5月11日上午才知道，并立即与郑邦炎等策划聚集那些平时联系较多的军队文体单位造反派去冲击；
- 4、在决定冲击演出前后，我不知道有任何人曾与“上级领导”、“主管部门”或者“中央（全军）文革”联系，也不知道是谁告诉“首都三司”等地方院校群众组织来参加冲击的。

#### 四、“‘五·一三’冲击三军演出”

5月11日上午，知道三军要在北展演出的消息之后，我立即找到海政文工团“思想队”的郑邦炎商量对策。我们认为，一定要阻止三军的联合演出！一定要让中央知道，我们才是反对三军党委、反对三军保守派的“真正造反派”！于是我们俩借了两辆自行车，马上去找总政歌剧团的×××，又分别给平时联系紧密的军内一些群众组织头头打电话，煽动他们一起去组织冲击三军演出的“革命活动”。

第二天下午（或傍晚）在海军大院西门外，可能是后勤学院（也可能是总参通讯兵部）的一间屋子里开了一个冲击三军演出的预备会。到会的人都是我们同一派的组织头头。记得有海政的我和郑邦炎、郑国培，北京军区文工团胡××，空军体工队李××、林×，高等军事学院姜××、陈××，总政歌剧团姜××，后勤学院黄×，和解放军艺术学院、军事测绘学院及海军护校等一些单位的代表。大家一致同意不惜动用“冲击”的手段阻止三军的演出，决不能让“老保”突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从而争取中央支持的阴谋得逞！当天我们计划了各单位出动人员数量、车辆安排、上车地点和时间，确定了第二天晚上在北京展览馆集合的时间。

5月13日这一天，我们都在联系组织晚上出发人员的事。中午和郑邦炎一起到总后勤学院找“星火燎原”的黄×，落实了晚上去北展由他们派车的事（他们在学院里是多数派，后勤保障比我们好，能调动一批汽车）。下午大约五点半，天色还亮，我们就登上三四辆卡车出发了！

到了北京展览馆前，尽管天色渐暗，却还是能看到偌大的北展广场上人头攒动，各色彩旗飘舞，车声、人声交织，广场旁边的通道、剧场前面的大广场、共至剧场外面通二楼的楼梯上都挤满了来自各个单位的“造反派”！全国闻名的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的大旗一面挨着一面，与军内文艺体育单位、各地军事院校“造反派”组织的大旗交集在一起，这很出乎我的意料——这么多单位来了这么多人，肯定不是我们前一天开的小会所能调动来的——我们下车以后，天色灰暗已经看不清彼此的面孔，只能大声叫喊着进行“联系”，谁也不知道这么多人集在一起下一步要干什么，结果只能是大家各自为战，跟着感觉、跟着人群，拼命地往剧场方向挤上去了！

我不知道先进去的人与演员之间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我进去的时候在剧场前厅看见一群人正在追打几个人，其中最容易辨认的是八一体工队的几个大个子。我不大认识这些人，也没和他们打招呼便径直往剧场里面走，一直挤到舞台前，看见舞台上已经是我们的人在挥舞占领中央高地的大旗；乐池里空无一人，一些大型乐器胡乱丢弃在那里……

我走上舞台往下看，看见对立派的演员们和一些未走的观众三个一团、五个一伙的拥挤在舞台前乐池边，斜眼看着在舞台上疯狂呼喊的我们，时而也回报以“坚决捍卫×××革命路线”、“宣传×××思想无罪，革命造反有理”的口号，回击我们的冲击……

海政歌剧团高正路回忆说：5月13日下午三四点钟，萧华在军事博物馆二楼礼堂接见军内两派的人员。我是和海工的李××一起去的。会上萧华说了“演的不要演，冲的也不要冲”，听起来有点向着冲派。两派人员当场就争论不休，接见也就拖长了时间。萧华还让工作人员给我们发了果子面包当晚饭。接见完我跟着八一体工队的人从军博直接就去了展览馆。第一次冲上舞台以后，听说三军派已经调集大批人马将我们反围困在剧场里面，如果不立即冲破包围圈，我们就出不去了。于是，我们就赶紧聚集人马冲了出来。后来周总理和杨成武凌晨三点在大会堂接见两派代表，我是跟军艺的车一起去的。

至于我个人，现在已不太记得如何从舞台上下来，如何从剧场出来，也不记得我在这第一次冲击中扮演了，什么重要的角色或是做出了什么值得记忆的行为，只记得我们的第一次冲击就以占领舞台、对立面的演出无法继续进行为标志而结束了。

## 五、第二次冲击

“全面胜利”的我们，挥舞着各自队伍的大旗，冲出了剧场，在混乱的人群中往北展正门前的大广场方向挤去——我们来时乘坐的汽车停在这里。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发生，可能我们的“冲击”就这样宣告“胜利成功”了！

在停车广场上，我看见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的赵××，在我和他谈话的时候，一个人向他报告了一条消息——清华“井冈山”蒯大富转告他：林副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说，冲击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演出是错误的！林副主席是支持演出的！林办让我们撤走。现场的大专院校主要组织现在都要撤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林副主席受骗了！我们必须让林副主席了解部队‘文革’的真实情况！”我还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从这个对全北京公开的舞台上退出，回到军队里听从三军党委“落实林副主席指示”，就等于自投罗网。我们必须留在这里继续战斗，争取得到中央首长的接见，直接向中央反映我们的声音！

于是，我们立即鼓动身边的人：“杀回剧场，争取中央首长接见！”

再上舞台时我看到的仍然是我们一派的人们占据着舞台中央的位置。这时，剧场的广播中传出了“林副主席办公室电话指示……”的声音，我和赵××站在舞台最高层合唱台中间，鼓动群众高呼我们要见中央首长的口号。对立面的一些演员则仍然在舞台下面，不时向我们发出几声抗议。但是双方都基本脱离了接触，只是在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后来，从剧场后台传来消息：周总琿要在大会堂接见我们双方的代表，让我们派人去。我们几个头头商议了一下，让海政话剧团的石静、军乐队的李希海等人去了大会堂，我们其余的

人都在剧场等候消息。

这样对峙到后半夜，外面传来消息：中央首长来了！

我当时正在舞台中央，听到这个消息后即大声指挥现场的人群在上场口给中央首长让出一条路来。首长们进来后，我又指挥舞台中间的人给首长们腾出几个座位，安排他们坐下。陈伯达、王力、萧华、谢富治等人均坐在最高一排合唱架上，我坐在下面一排（我的这些活动被人拍了照片，后来发布在三军在全国各地张贴的大宣传海报头条。我也因此被指认为“现场总指挥”）。一些对立面的演员们也聚拢到舞台前面。是陈伯达最先讲话（由王力逐句翻译）：“你们两方面可以暂时不见面，感情很冲动。不见面也好，隔开一个时候，隔开半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或者十年再见面，那个时候的想法可能跟今天不一样。那时候，就会双方握起手来，就会互相抱头痛哭，说是作了一件很错的事。”（引自《四海翻腾》第五期，海直机关××派主办，1967年5月15日）。当时我的感觉，他的讲话并没有支持我们，当然也没有支持对方。

在他们讲话并退场以后，天色已亮，我们也退出剧场，乘车回到海军大院了……

据高正路回忆：当晚去大会堂参加周总理接见是陈伯达一行到达剧场以后宣布的，两派的代表分开乘车，在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周总理接见了双方代表，并批评了冲击演出的行为。海政话剧演员石×还竭力争辩、大声哭诉，并站起身来想挤到总理身边辩论，结果被警卫人员反按在地毯上，任他使劲挣扎也不撒手，直至拖出礼堂。

这就是我参与“‘五一三’冲击二军演出事件”的全过程。

## 六、对“五·一三”事件的几点认识

第一、“五·一三”事件成就了林彪及其集团，这是上了中央文件的历史事实。

现在反过去看，“文革”伊始林彪发觉“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搞垮人”之际，他所作的就是抓紧“清理门户、扎紧篱笆”——对“企图分庭抗礼”的罗瑞卿，坚决清除！而对老四野的萧华、邱会作则是坚决保护。甚至在北京军区文工团第一次“绑架”萧华之后，林彪竟然近乎失控地发了“文革”中第一次“雷霆万钧”的脾气，将江青叫到毛家湾臭骂一顿，吓得叶群当场下跪。

紧接着他批准的“军委八条”，才是他心里的声音，也是他“文革”中第一次企图以中央文件形式控制大局的努力——任凭风起云涌，他的一亩三分地不容外人染指！

可是4月份“军委十条”的发布，将他严守军队阵地的努力又一次冲垮；眼见三军的黄、吴、李、邱在冲击下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可是面对毛发动的造反运动，又不便直接反对，只能坐在自己的屋子里等待时机……直等到“五·一三”，我们一帮二十多岁的“年轻闯将”给正在瞌睡的他送去了一个枕头——

事先摸到了毛保吴法宪和毛身边的一些演员正在参加三军演出的底牌；

不听从“招呼”，不服从“首长”，竟然配合“中央文革”的意思，将指示演、冲双方“演的不要演，冲的也不要冲”的萧华抛出来，将之斥为“总政阎王殿”的头子，从此打倒；

委派叶群亲临各军兵种机关表示慰问及去医院看望三军伤员；

平时连中央会议都尽量躲着不参加的林，竟然亲自出席观看三军演出……

几步棋的结果是：三军党委领导从此被标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

北京的“文革”形势从此被牢牢地掌握在军队手中；

“看三军联合演出”成了大批干部“亮相”到“革命路线”一边的最新形式；

一夜间，三军就可以将全北京的大字报大标语全部更换为他们拟定的内容；

由北京再到各军区、舰队、基地……由解放军直接出面发动连续几天的舆论造势，就可以左右全国的形势变化；

“全国看北京，北京看三军，三军看海军，海军看红联总”口号在全国流传；

从此，“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成了“文革”的后方保障，连“中央文革”也不得不“屈尊”听从军队的意见……

由于“亲密战友”直接指挥的军队提供了全国局势稳定的保障，使得毛可以更加放心地去“深化革命”，这就使毛本人对此局面也乐得接受下来（直至林彪“一号命令”的发布引起他再度“大权旁落”的警惕）。

一直只能暗中抵制“文革”的林彪，成了“五·一三”事件的最大赢家！

林彪集团，从此成为一支唯一能与“中央文革”抗衡，令毛也不得不倚重的政治力量。

用叶群后来得意洋洋的表白来说，就是“首长没讲一句话，就看了一场戏，就把那个‘冲派’压垮了”。

第二、我在被“专政”一年之后曾经对专案组长说：我真心感谢将我“专政”起来，使我少犯了很多错误。否则，若当时年仅23岁的我成了胜利者，我会比现在“整”我的人想出更多的坏点子整别人，甚至从此一辈子都走上另一条道路……

这句话应该是我当时“冷思考”的结果之一。

“五·一三”事件使我与林彪集团从此“势不两立”——当年夏天我就多次跑遍驻京部队文体单位，专心致力于搜集三军的动态、情报，整理成文，甚至明确写出“林彪挟天子以令诸侯”、“三军可能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的秘密报告……

这些活动又导致我成了军内第一个被“专政”的“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尝受了七年的牛棚之苦……

这些遭遇使我不得不与热血沸腾的文化大革命“隔离”，不得不开始冷静地观察和思考自己和他人的所作所为；在林彪“一号命令”以后又与一批受迫害的老干部一起被押解“疏散”到湖南冷水滩继续“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得以结识了一些根本不买林彪、“中央文革”和江青

的账的老军人长辈朋友，接受他们的影响……在“林彪事件”后我们被解放出来，在要求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又不断地提高自己对“文革”、对极“左”、对体制……的认识，逐渐地在实践中感悟出极“左”思潮对国家、对自己的侵蚀和危害，从而又使我逐渐摆脱了“文化革命”和“中央文革”的极“左”思潮对自己思考习惯、行动习惯甚至整个世界观的影响，逐渐地站到了正确的立场上，并且为后来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比较正确的认识打下了政治基础……

第三、近年来见到网上网下有一些涉及“五·一三”事件的文章，有的说是1967年4月空政“硬骨头造反团”的刘淑媛和小邵、小李去见毛主席，然后毛的秘书徐业夫到毛家湾找叶群，叶群接见了几个女演员，直接提议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中同一观点的人串联一下搞联合演出，似乎是空政的几个演员首先提出组织“纪念演出”的倡议……

有的则说，“1967年的元旦刚过”，“来到中南海西门”，得以面见毛泽东，痛斥反动组织“黑旗造反团”，并当场得到毛“找叶群”批示的，是小孟、田大头……

对此，我质疑——

如果真是“小孟、田大头”“1967年的元旦刚过”就得以面见毛泽东，甚至具体谈到单位“文革”的问题，那其他文章所提及的刘淑媛等就应该是在小孟之后启动的“毛主席—叶群—吴法宪”程序。按当时的“潜规则”，先见伟大领袖者肯定要位居一派甚至一单位之首。而事实却是刘淑媛后来成了“革委会主任”，而“小孟、田大头”却在“五·一三”事件后加入了我们“冲”派的演出队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说法似乎在指向一个至今尚无人提及的事实——毛泽东事先就知道三军要联合演出并且对立面要冲击的消息，然后再指示女文工团员去找叶群……

另外，如果真的是得到叶群指示、吴法宪支持的空政文工团女演员率先去联合其他单位共同演出在先，就轮不到海政“拼到底”的人再去各单位串联；按当时万众拥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实际情况，即使海政的人是“二手”串联，其他单位也不敢公然将人“打出来”。

最具反驳力度的是——如果真是空政的几个女演员通过毛主席—叶群—吴法宪的关系促成了三军联合演出和林彪后来的大力支持，后来影响遍及全国的“老三军”就应该以空军为核心，而轮不到海军政治部“红联总”来充当三军的核心，更不会有“全国看北京，北京看三军，二军看海军，海军看红联总”口号的出现。

不过，如果说她们是在先接受海政的上门串联后再去找毛，从而“促成”演出的实现，则可能有些可信度，但在时间顺序上就必须给予澄清了。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五·一三”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关于5月的演出，周恩来曾明确指示“要由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演出。你们联合演出我就去看，不联合我就不看”。这一指示是完全合乎毛泽东本来意图的。萧华和“全军文革”向下转达要联合演出的意见也并无不当。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毛的秘书徐业夫出现了——“文革”专家王年一：“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徐业夫1967年4月间赴毛家湾，是奉命向叶群面授机宜的。徐业夫平时极少外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如果只是为了向叶群说一句‘主席说，让叶群找她们谈谈’，原本是没有必要来到毛家湾的，电话上就完全可以讲清楚。一定要到毛家湾面谈，无疑有其重要性和机密性。找的又是爱惹是生非的叶群而非林彪，这更有特异之处。”

在当时，“林彪、叶群本来没有任何必要同周恩来唱对台戏，除非得到最高方面的授意”。



如此说来，倒是毛本人一边在倡导大联合，另一边又让徐秘书去见叶群授意三军党委支持一派单独搞演出……这样一来，“五·一三”事件的总导演倒是非毛莫属了。

在目前未见当事人出而澄清事实，又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这些“戏剧性”分析只能暂时停滞在此。

□ 原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  
【会议简讯】

“九一三事件”研讨会在京召开

· 丁凯文 ·

今年是“九一三事件”四十周年，8月24日和9月4日在北京分别召开了两次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研讨会。

8月24日，文衡文化公司与《记忆》编辑部在京联合召开了“九一三事件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并提交学术论文的国内学者有林蕴晖、余汝信、蒋健、董国强，专程回国参加会议的有丁凯文和夏继波。主持会议的学者是吴迪和李宇锋。列席该次会议的还有卜伟华、丁东、叶维丽、邢小群、阎长贵、王海光。林蕴晖的文章重点论述了林彪与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关系，余汝信的文章主要涉及李作鹏与“九一三事件”的关系，蒋健的文章则系统地论述了“九一三事件”的过程，试图厘清该事件发生的每个细节，董国强的文章的重点放在“批林批孔”运动与江苏省军管的关系问题，夏继波的文章关注于文革期间周恩来、林彪与文革极左派江青的关系问题，丁凯文的文章探讨了文革期间的军委办事组。学者们在讨论之间还对相关问题相互作了评论。

9月4日，北京召开了“九一三事件”文史研讨会。这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首次由民间举办的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研讨会。与会者近五十人，参加会议的人士有亲历“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他们的直系亲属，以及研究学者等。与会者包括原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的翻译沈庆沂，他曾亲身参与林彪256号飞机坠毁现场勘察。与会者还有林豆豆丈夫张清林，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儿子贺铁军，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儿子阎明，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儿子王鲁宁，原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的夫人刘继馨、儿子胡耀萍、胡幼萍、吴法宪女儿吴巴瑾、江腾蛟女儿江新文、江新德、原林彪专车司机杨振纲的女儿杨军玲、256号飞机的机械师邵起良女儿李蔚等。参与会议的学者有李延明、姚监复、丁凯文、卜伟华、徐海亮、徐友渔、陈子明、丁东、王海光等人。会议由刘家驹筹备，高瑜主持。会议达成了预期的目的，圆满结束。

本期编辑：
胡海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